

# 每本书都有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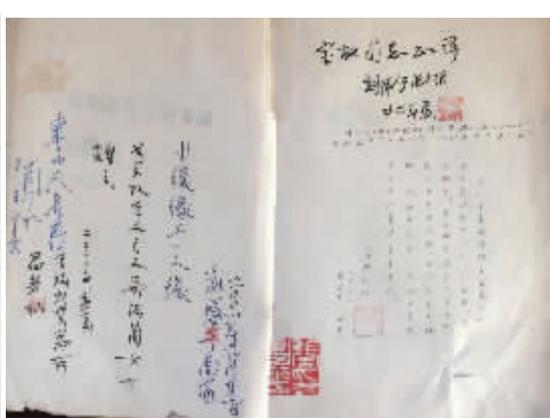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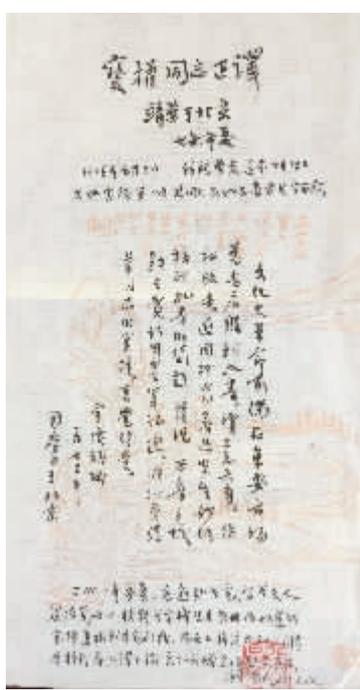
■张昌华

20多年前江苏有本杂志叫《书与人》，专刊书与人的故事，颇受读书人的欢迎。岁月流变，拜金风盛，人书俱老，那杂志关门打烊了。印象中某出版社在宣传出版理念时说“一切为了人与书的相遇”，倒真有点卓尔不群。

书与人都是有生命的，而命运的归宿往往很偶然，书与人的相遇，是讲究缘分的，因此产生许多佳话，诸如黄裳的《珠还记幸》之类。我收藏一本A·绥拉菲摩维支的《铁流》，1931年初版毛边本，距今86年了。该书译者曹靖华先生和鲁迅研究者戈宝权先生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，在该书中各自留下两次手迹。此书系戈夫人梁培兰所赠，故我也请她签了名，以示“正本清源”，流传有绪。2001年我在南京遇到周海婴，述说此书来龙去脉，海婴签了句“书缘源于人缘”；2008年我编《鲁迅的艺术世界》在上海讨论书稿，将此书示于周令飞，令飞拜观后感慨良多，信手签了“书比人长寿”。如今曹靖华、戈宝权、周海婴三位先生都次第凋零了，而书依旧站在我的书柜中，真令人唏嘘不已！

古训云“盛世藏古，乱世藏金”。刻下，读书人中收藏签名本者益多，毛边党也不少。我本俗人，这些年出了几本小书，亦喜题签送人。无意中产生了书易数主的故事。

70多岁的我，竟被朋友拉到商务(南京)印书馆去服“书役”，



左图：《铁流》封面  
中图：本文作者张昌华作题字释文  
上图：曹靖华、戈宝权、周海婴、周令飞题字

打杂。每周一去“点卯”一次。同室三人，坐在我后面的小宋是熟人，人称“老夫子”，终日不忘在孔夫子网上捡漏、淘金。某日，淘得一本我10多年前赠杨振宁先生的旧著《走近大家》，乐呵呵地央我写段话，说明为何赠此书之类。坐在末位的年轻女编辑。(恕我不恭，同室半年，尚不知名姓，她每见我称先生，点头一笑而已。)或许受“老夫子”影响，日前她也捧着从网上淘到我的《民国风景》《走近大家》和《青瓷碎片》签名本，求我题跋述说书背后的故事。此时方知她的芳名，是位博士后，

专事编辑佛学典籍的小刘。我打开一看，不禁手心出冷汗。我告诉她，这都是20多年前的同事，不过有两位已英年早逝。一位在场的“快嘴李翠莲”开玩笑说：“小刘，你手这么臭，怎么尽买死人的东西。”小刘泰然，仍面含笑容，但我觉察出她脸上霎那间飞逝过一片阴云。我忙打圆场说：没关系，我明天送你一本长寿老人周有光签赠我的《人类文字浅说》，另外再送一张我为周老拍的百岁照，冲一下你的手气。小刘很高兴。我告诉她这本“浅说”小书后面就有温馨的故事：某年，我搬家处理一

批旧书，不慎将这本书流入坊间，为认识我的一江西读者小周从孔夫子网上淘得，她以高价得手后，说要送我。我婉谢，因我有周老多部签名本。然而，她还是寄来了。宝物失而复得自然高兴，但我总觉得无功受禄不免有愧。我知她是“董迷”，遂将董桥题赠我的《月白风清》转送，并为她写了本册页。小周又觉不安，馈赠家乡农耕笔庄的毛笔多次……

人老健忘。记忆捉弄我，回到家翻箱倒柜怎么也找不到那本“浅说”，倒找着了周有光先生捎来的《晚年所思》，虽有手温，却无

签名，决定以此充之。我在扉页上写了一段长跋，详述赠此书的原由，并粘贴一张手书“刘丹吉祥”的红纸条。周一，我例行要去馆里“点卯”，忽然想起送小刘周老照片的事，忙在几个盛旧照片的大茶叶盒里逐一翻找，意想不到地翻出那本64开“浅说”小册子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好不高兴。望着手边已题签的《晚年所思》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这本“浅说”送还是不送？也只是犹豫一下，我毅然将“浅说”揣入包中，还是让这本小书添段故事吧。

# “由稚吾”不是唐长孺

■肖进

近日翻看王素笺注的《唐长孺诗词集》(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)，史学大家从事新文学翻译的并不多，唐先生可算是其中的一个特例。据唐长孺弟子王素先生的引述，唐长孺先生前后翻译过的作品有：赛珍珠的《大地》《分家》《东风·西风》，富兰克林的《富兰克林自传》，奥尼尔的《月明之夜》，以及史蒂文森的《金银岛》和葛蕾勃尔的《新中国》等。作为一位史学大家，唐先生被后世关注更多的是其史学成就，早期的翻译行为则不太为人所知。王素先生笺注的《唐长孺诗词集》不仅从诗词的角度给唐先生做了一个别样的自传，而且对唐先生早期翻译所做的史料搜集作出了贡献。

唐长孺先生是江苏吴江人，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，之后辗转中学任教。其从事翻译工作，与早期在“嘉业堂”读书有关。据冻国栋先生《唐长孺先生生平及学术编年》引述，唐先生在“嘉业堂”“常览者有三：一为中国古典文学；二为‘五四’以降之‘新文学’；三为17世纪以降西洋之文学名著”。由此看来，唐先生之从事翻译，虽有生活的压力，自家兴趣也不可无视。柳亚南先生在《忆唐长孺教授》中说，唐先生在上海“圣玛利亚”女校任教时，

“用有闲时间译了一本书名《爱国者》的小说，不用己名，用他妹妹唐齐(露葵)的名字去投稿。书出版后，出版社通知他妹妹去领稿费，弄得大家都愕然”。

但王先生所述唐长孺的翻译中，对赛珍珠《大地》的指认似乎有待商榷。赛珍珠《大地》的“由稚吾”译本，被王素先生认为是唐长孺先生以笔名翻译的作品。王先生还曾就署名问题专程探询唐长孺哲嗣唐刚卯先生，刚卯先生亦未确切，只说“他在翻译赛珍珠的《大地》时所用的是我一位姑母的名字，据说寄稿酬时，收款人是我姑母，曾为笑谈”。对此，王素先生亦认为“正误亦参半焉”。王素先生推断，《大地》署名“由稚吾”的缘由，盖因为“领取稿酬者为唐齐，盖‘吾’即指其妹，‘由幼稚之吾’译述，由幼稚之妹领取稿酬，亦甚匹配也”。

但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找和比对，笔者认为，唐长孺先生没有翻译过《大地》，“由稚吾”并不是唐长孺笔名，而是实有其人。由于由稚吾和唐长孺的译本都有译者序言，我们可以对比“由稚吾”与唐长孺的译序，看二者之间有无风格和表述上的区别。

对比“由稚吾”和唐长孺的译序，首先是二者在赛珍珠名字的翻译上不一致。

“由稚吾”的《大地》译序称赛珍珠为“巴克夫人”；唐长孺在《东风·西风》和《分家》中称赛珍珠为“白克夫人”。称呼上的不同反映出译者的翻译习惯有别。其次是语言表述风格上的差异。“由稚吾”在谈到赛珍珠的父亲时，用的是“一个帝国主义的先锋队，一个传教士”这样的称呼，语含批评；唐长孺则认为赛珍珠的父亲是“一位热心的传教士”。在20世纪上半期，汉语语言中的帝国主义一词，基本是作为侵略的代名词而存在的，称赛珍珠的父亲是“一个帝国主义的先锋队”，显然不是正面意义上的表述。反之，唐长孺用的“热心”一词则显示出他相对认同赛珍珠父亲的传教行为。如果说在赛珍珠名字翻译上的“巴克”和“白克”之别，是语言翻译的习惯问题，那么对赛珍珠父亲的传教以及对其所代表的国家的看法，则凸显出译者对西方传教士的认可度和国人不同的民族观，这么大的反差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显然难以解释。第三，在对所译作品的评价上，“由稚吾”持批评态度，他直指这部作品的艺术性不强：“平心而论，像这样一部作品，在纯艺术的观点上，不应当能博得这样的虚名。”而《大地》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，是因为赛珍珠把中国丑陋的一面暴

露给了外国人。也正因为此，“由稚吾”对《大地》的翻译，并非完全忠实于原作，而是采取了节译的方式，事实上成为一个“洁本”。唐长孺的译本对小说的艺术上的评价不多，但寥寥数语，也能显示出译者的爱憎。如对赛珍珠的评价，说“她是专以中国社会状况为写作题材的一位美国作家，而尤以描写农村灾象致深刻动人为人所称道”；对《大地》三部曲，认为“反映着中华民族由古老帝国，经过军阀割据而抵达现代中国的三个不同阶段……可以当它做纯文艺小说读，也可以当它做错综复杂的社会史来读”；对《东风·西风》，唐长孺没有像“由稚吾”那样指责赛珍珠暴露了中国丑陋的一面给外国人看，相反，他从正面指出，赛珍珠的小说使外国人知道“中国人坚毅朴实的性格，使他们知道中国人宁静自足的心境”。

可见，“由稚吾”翻译的《大地》与唐长孺翻译的《分家》和《东风·西风》在翻译的习惯和批评风格上有较大的差异，尤其是在对赛珍珠及其作品的评价上，二人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反。“由稚吾”的激进显示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，而唐长孺的认同性评价则体现出他对赛珍珠及其作品的温和接受。